

数字化赋能高职师德评价的价值意蕴、时代转向、反拨机制

◆吕雪

摘要:数字化赋能是数字化时代高职师德评价的必然趋势,数字化赋能必将为高职师德评价提供重要支撑。数字化赋能高职师德评价的价值意蕴体现在数字化对高职师德评价的客观性被数字记忆所提高、全面性被多源异构所增强、深入性被见微知著所提升,进而构建出一个系统且科学的数字技术密集型师德评价范式与评价体系。然而在数字化赋能下,高职师德评价正经历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评价理念转向、从外在管控向内在提升的评价旨归转向、从学习认知向过程质量的评价重心转向、从一维平面向多维立体的评价标准转向。面对这些时代转向,高职师德评价的反拨机制应着力完善决策、高职师德教育优化过程、高职教师个体师德提升,这样才能够最终实现以高职师德评价促进教师个体师德的提升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的终极旨趣。

关键词:数字化赋能;师德评价;反拨机制;本真价值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4289(2024)02-0039-06

师德评价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贯彻落实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务院颁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方案明确指出,要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1]。但是,由于师德自身具有长期性、内隐性、多源性等复杂特征,使得师德难以进行精准的量化,严重影响其立德树人实效。在数字化赋能时代,依靠传统经验的师德评价工作已难以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利用智能分析工具开展师德评价已成为必然趋势。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最新产物,数字化提供了高职师德评价的技术工具。数字化赋能高职师德评价不仅提供技术红利,同时还是师德评价保持与数字化赋能同步的时代诉求。此外,数字化赋能高职师德评价,有利于评价功能回归促进发展的初衷^[2]。

一、数字化赋能高职师德评价的价值意蕴

数字化赋能是以数字化技术驱动事物的发展。

作为当前先进的信息技术代表,数字技术为观测教师的思想行为提供了新的工具,为高职师德评价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数字化赋能高职师德评价所蕴藏的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高职师德评价的客观性被数字记忆所提高

掌握的数据信息越是全面可靠,那么评价的可信度自然越高。以往受制于技术手段,相关部门很难获取高职师德真实发展情况的数据信息,更不用提准确把握师德水平。加之,师德领域中数据信息的搜集获取并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重复性、可控性与客观性的特点,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师德情况面前,以往的数据信息采集手段显得尤为乏力,大大降低了师德评价的信度与效度。

吉姆·戈梅尔与戈登·贝尔指出,“生物记忆和数字记忆的明显分殊,前者是主观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后者是客观的、不掺杂假象的”^[3]。在数字化赋能情境下,相关评价者能够摆脱主观臆测、经验评价及印象积累开展基于客观数据信息的高职师德

评价。加之,数字化记忆是一种打破时空限制的敞景式记忆,与以往搜集数据信息的方式比较,在粒度、密度、维度、自然性、联系性与实时性等方面数字化记忆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大量的数据信息是在没有人参与的过程中获取的,这就有效避免了数据信息的失真。此外,所搜集的数据信息不会刻意考虑目的与场景,其作用完全可能超出其最初收集者的想象^[4]。这不仅能够增加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同时还能够增加数据信息的可靠性,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以往高职师德评价中自带的强烈主观色彩的评价倾向。

(二)高职师德评价的全面性被多源异构所增强

高职师德评价的全面性是指师德评价不是局限于师德的单一方面,而是综合考虑师德评价的多方面。也就是说,高职师德评价,应该是一个兼顾多方面因素的系统工程^[5]。然而,由于过去获取信息渠道单一,使得教师个体师德构成要素不能有效实施量化,评价者仅仅凭借有限数据信息来对教师个体师德进行评价,容易导致评价主观片面。

在数字化赋能高职师德评价的今天,教师个体师德状况与水平的数据信息比任何时代都更加丰富与全面。凭借数字化这种无时无处不在的智能评价技术,师德评价者能够获取教师个体心理、思想、道德、言论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有效地将过去因条件不充分而无法覆盖的领域范围都囊括进来^[6]。通过因繁就简地分析这些多源异构的数据信息,就能对教师个体师德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内外考察,不仅能有效地避免师德评价方面存在的片面行为,同时还能科学精准地把握教师个体师德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而最大程度提升师德评价效度。

(三)高职师德评价的深入性被见微知著所提升

人们应辩证唯物地看待教师个体的师德外在行为与内在的动机,这是因为教师个体的思想、道德、政治等方面的品质经常会表现出内外的不一致性,若仅仅依据外在的行为表现对教师个体进行师德评价,这种以偏概全难免出现失误。为此,在高职师德评价实践中,不仅应以外在的师德行为表现为依据,同时还应兼顾内在的师德动机与价值立场,

不仅应对那些出于好心却办坏了事情的教师多一份包涵与宽容,同时还应该对于那些个别的师德行为失范者予以高度关注。尽管伊曼努尔·康德曾认为最严格的省察也难以完全弄清隐藏着的动机^[7],但在当前的数字化赋能之下,师德评价者在对教师个体师德行为表现掌握的同时,还能够对教师个体这些师德行为表现的心路历程进行实时的洞察。

二、数字化赋能高职师德评价的时代转向

在新时代,伴随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教育现代化速度持续加快,评价回归本身价值与功能趋势日益凸显,高职师德评价也必将发生相应的变革,逐步回归高职师德评价自身的价值与功能。加之,这一相应的变革是全面的、整体的,而不是片面的、部分的,在理念、思想等内在的内涵层面与技术、方法等外在层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评价理念转向

在个体价值受到重视的当前社会,高职师德评价的人文主义价值受到重视成为必然选择,同时这也成为新时代高职师德评价变革定位的方向。为此,亟待将师德评价从科学主义为方向的量化与实证中解放出来,对高职师德评价理念进行重审,树立人文主义的高职师德评价理念。而要实现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评价理念转向,必须具有以下三点认识。其一,应充分认识到人文主义师德评价是一种肯定“人”为主体地位的师德评价,其强调为了教师、依靠教师、尊重教师,不仅要着眼教师队伍整体的师德,同时还应该承认教师个体师德差异,最终以促进教师个体师德提升为旨趣;其二,应充分认识到人文主义师德评价的全方位性,不仅应关注教师个体师德的知识与行为,同时还应对教师个体的态度、意志、情感、价值观等方面予以关注,换句话说,应是对教师个体在知、情、意、行方面进行的整体评价;其三,应充分认识到人文主义师德评价是一种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评价范式,在师德评价过程中须将全面性、复杂性、客观性、精确性等兼

顾起来,强调价值判断的精准性,突出师德评价的人本性与内隐性,实现人文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二)从外在管控向内在提升的评价旨归转向

由于深受科学主义评价理念的影响,为方便师德评价者进行有效管控,各级各类高职的师德评价者几乎都采用所谓绝对客观公正的量化评价,且制定出详细具体的量化评价指标赋分标准,教师个体只要按照师德评判标准从事教育教学活动,就能够获得良好甚至优秀的师德评价结果。不可否认,通过这种师德量化评价标准,评价者可以轻而易举获得师德评价结果,将师德评价的甄别、选拔功能充分地展示出来。但是,这种外在管控方式的评价与高职师德评价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这不仅表现在对师德评价效果的影响,同时还表现在对师德评价本真功能的制约。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单纯依靠对教师个体的师德知识及行为记录给其贴上相应的师德等级标签,不仅缺乏科学性,也违背了伦理要求^[8];其二,师德评价赋分是一种强有力的引导,在这种强有力的引导干预下,不仅教师个体师德发展的主体性被束缚,同时也削弱教师个体在师德方面的创新意识;其三,师德评估方面过分追求外在管控量化指标,容易对教师个体的师德修养产生误导,不利于教师个体师德修养的真正提升。

美国学者斯塔弗尔比姆认为,“评价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9]。也就是说,评价的旨趣不在于对教师个体师德水平形成既定的判断,而在于如何促进教师个体师德水平的提升,是对以往那种外在管控方式的一种超越,其关注的是如何利用师德评价结果服务教师个体发展,旨在使得高职师德评价结果成为促进教师个体提升内在师德的推手,回归高职师德评价的树人本真,不仅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同时也与师德评价的内在规律相适应,其不是为了外在的管控进行评价,而是为了提升教师个体内在师德进行的评价;不是以获得教师个体师德评价的最终论断为追求,而是在了解教师个体师德状况的基础上为教师个体内在的师德提升提供

针对性建议;不是强调评价结果的奖惩功能,而是重在强调评价结果的激励、导向的育人功能,为教师个体师德的内在提升提供参考,进而成为教师个体提升师德的重要驱动力量。

(三)从学习认知向过程质量的评价重心转向

当前,在关于高职师德评价的内涵方面,学界已经达成一种共识,都一致认为其是科学判断的过程。然而,在师德评价内容及对象方面依旧存在着某些人为的意见分歧,还存在功能定位、话语权、评价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导致高职师德评价沦为简单评“教”,而教师个体师德提升过程却成“被遗忘的角落”^[10]。其实教师个体的师德提升是内外相互作用的结果,且外在引导在教师个体师德提升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高职师德评价的过程质量能够对教师个体师德发展状况产生影响,若不对师德效果进行有效评价,则难免有“只求收获、不问耕耘”之嫌疑,同时还会有责任推诿的嫌疑。

认同并信奉后天因素在教师个体师德提升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从事师德工作的重要前提,同时这也是师德工作者所应具有不可推卸的职责所在。因此,当前师德评价应从学习认知转到过程质量上。总而言之,实现从学习认知过程向过程质量的评价重心转向,不仅是高职师德评价变革的时代诉求,同时还是高职师德评价回归本真的应有之义,是师德评价特性的必然结果,也是高职师德教育及评价者应承担的职责。

(四)从低维平面向多维立体的评价标准转向

长久以来高职师德评价缺乏科学、公正、合理的师德评价标准,导致评价的公信力度不强。因为受到诸如评价的理念、技术手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当前高职师德评价主要集中在教师个体的师德认知维度,以低维平面的教师个体师德认知来替代对教师个体师德的立体评价,忽视了与教师个体师德认知不相关的师德情感、意志、态度等维度的评价。很明显,片面地用低维平面的教师个体师德认知评价来替代对教师个体师德的立体评价,这既不科学,同时也不公正。而这是因为师德认知不等于师德行为,师德行为也不能等同于师德认知,

知而不行、行而不知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另外,教师个体师德中的情感、意志、态度、动机等虽不容易精准测量,但这些却最能体现教师个体的师德特质。为此,不能简单以道德知识的记忆和道德行为的熟练程度与出现与否来判定一个人的道德品质^[1]。比如在某些高职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有用科研水平高低来衡量教师个体师德水平高低的荒谬现象。

技术层面分析,高职师德评价是通过科学手段,在获取相关信息基础上,对师德活动及教师个体所进行的价值判断。马歇尔·麦克卢汉指出,“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12]。不可否认,在数字化赋能高科技发展时代,思考衡量高职师德评价在需要理念审视指引方向的同时,还需要工具层面的技术改进。数字技术被认为是当前观察记录人行为最先进的“显微镜”,不但可以对教师个体显性的师德行为表现进行全方位的追踪记录,而且还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对教师个体的师德动机、意志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进而折射出教师个体师德动机与情感等。为此,借助数字化赋能高职师德评价,高职师德评价者可以结合知、情、意、行等要素对教师个体师德进行多维立体的评价,进而使得高职师德评价更加全面科学合理。也就是说,高职师德评价者在获取教师个体师德学习认知层面的数据信息基础上,还可以全方位地捕捉获取教师个体师德评价方面的数据信息,进而能够对教师个体师德理念、价值观、情感变化、认知水平、行为方式等进行全方位的深入分析。

三、数字化赋能高职师德评价的反拨机制

作为实现高职师德目标最不可或缺的手段,高职师德评价对于实现师德目标具有反拨功能。在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新时代,亟待对高职师德评价的功能定位与价值导向进行重新审视,在对师德评价甄别功能进行淡化的同时,应对师德评价所具有的全面发展功能进行引导。

(一)高职师德教育完善决策

高职师德教育决策是对师德教育实践的抉择,

其对高职师德教育效果与教师个体的师德提升都会产生直接影响。很显然,有效数据信息是高职师德教育决策科学的关键,然而,在数据信息匮乏的时代,教师主要依靠个人教学经验对课堂上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判断并制定教学决策。^[13]数字化赋能已经成为高职师德教育决策的指南,而尽可能获取相关信息、挖掘有效数据信息,才是高职师德评价最为重要的环节。数字化赋能下的高职师德教育评价是对以往传统师德教育评价方式的一种进化,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能够实时获取有效信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伴随数字化赋能高职师德教育水平的提高,能进行量化的师德教育要素将会越来越多,高职师德教育评价相关的数据信息日益增多,提取有效的数据信息能提高高职师德教育决策质量与效率。其一,借助先进数字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高职师德教育决策者对各种决策方案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通过科学合理研判各种决策方案出现的预期结果及出现预期结果所需条件,对高职师德教育决策者结合当前实际选择出最佳的高职师德教育决策方案是极其有利的。其二,数字技术所具有的实时监控特征能够帮助高职师德教育决策者及时增加变量,以验证高职师德教育的科学有效性。其三,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人类缺陷,依靠技术搜集、分析与处理数据信息来不断完善师德教育决策机制,进而能够产生更为严谨的师德教育决策判断。由于充分利用有效数据信息,能够摆脱以往因数据信息不充分采用直观判断的弊端,基于数字化赋能的大数据分析使高职师德教育决策更为科学合理。其四,通过数字化赋能,那些具有丰富决策经验的高职师德教育者还可以借助数字化平台分享自己的师德教育决策经验,而这不仅可以为后人提供借鉴,同时还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高职师德教育决策价值。

(二)高职师德教育优化过程

构建教师个体发展为导向的树人机制是高职师德教育的根本旨归,除了对高职师德教育目标达成程度进行检验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优化高职师德

教育过程。高职师德教育评价对师德教育各环节的数据信息获取与反馈产生直接影响,为此,高职师德评价是优化师德教育过程的有效途径。当前数字化赋能下的高职师德教育评价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师德教育信息覆盖,实时洞察师德教育过程变化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即时反馈评价信息,对于变化的内在机理进行及时分析,同时提出针对性的高职师德教育改进建议,用来调整师德教育过程。

其一,基于数字化赋能高职师德教育评价的精准化师德教育方案,可以为教师提供个性化的师德教育服务。在当前数字化赋能的时代,高职师德教育者的工作能力要实现从传统的知识素养向当前的数据信息素养转型,必须具备依据所获取数据信息确定具体高职师德教育能力。通过借助数字技术挖掘高职师德教育评价数据,高职师德教育工作者能够挖掘出教师个体师德提升中最为有效的数据信息,通过洞察教师个体师德困惑与需求相关的数据信息,勾画出教师个体师德发展的画像,进而有针对性地调整个性化师德教育策略,为不同水平层次师德个体推送订单式的高职师德教育方案,针对性地开展对教师个体具有高影响力的高职师德教育活动,让高职师德教育活动做到需求导向、因材施教,最大限度地提高高职师德教育的有效性。

其二,基于数字化赋能构建的高职师德教育预警机制,可以有效开展高职师德教育干预。高职师德教育预警机制是指高职师德教育工作者通过数据挖掘手段对相关教师个体的数据信息进行深入分析,以预测教师个体的思想、情感、价值等方面的状况,并及时采用相应手段,对于教师个体的失德行为进行有效的防控。数据信息虽然是对过去的记录,但是却能够推测未来,数据信息在对人们已有行为进行表征的同时,还能够揭示出人类下一步的思想动态。数据信息在捕捉教师个体师德行为的同时,还能对教师个体的师德发展动态进行及时的洞察。根据高职师德教育评价反馈的大量有效数据信息,高职师德教育工作者能够及时洞察教师个体正在发展的思想动态及发生的行为变化,在觉察到不良倾向性问题之后,即刻采取适当的干预行为,尽

可能地避免教师个体出现师德失范行为。

其三,基于数字化赋能的高职师德教育规律认识,可以优化师德教育过程。由于高职师德教育活动及过程具有复杂特性,此外还受到洞察教师个体师德水平的限制,当前学术界在高职师德教育规律认识方面还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高职师德教育工作的开展通常建立在高职师德教育对象平均水平之上,不具备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普适性,难以针对具体对象的德育工作进行有效指导^[4]。数据信息反馈是优化高职师德教育过程重要的一环,数字化赋能下的高职师德教育评价产生了大量的评价资料,高职师德教育工作者通过深入分析与挖掘这些与教师个体师德状况及规律相关的数据信息,不仅可以实现高职师德教育工作反思的数据信息化,同时还可以阐述和验证相关理论,进而提炼出新材料、新知识,最后在这些新见解中丰富并完善相关理论,为今后的高职师德教育优化增效赋能。

(三)高职教师个体师德提升

不可否认,高职师德教育评价具有诊断、管理、导向等功能,然而在当前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社会中,教师个体师德提升才是高职师德教育的根本旨归。高职师德教育评价的本真不在于对教师个体的师德形成某种固定的结论,而在于回归到高职师德教育个体提升自身,以实现教师个体师德提升的增值,使其成为教师个体自我提升的重要载体与途径。对于教师个体来说,可以通过数字化赋能高职师德教育评价,激发教师个体积极向上,为教师个体的发展提供精神支持。

从横向方面来讲,数字化赋能特定群体的师德发展,有利于形成彼此促进的激励机制。数字技术所具有的智能分析功能,能够精准地分析某一类教师个体的师德特征,且在不断形成的数据信息的过程中刻画出此类群体的画像,然后采用可视化的对比,教师个体能够对自身师德状况有全面清楚的理解,以此为基础探寻出教师个体师德提升的方向。另外,通过与其他同类教师个体师德发展历程的横向比较,在比较过程中有助于精准把握教师个体的师德优点与不足,这不仅能激发起教师个体不甘人

后的进取心,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形成基于教师个体师德提升的建议,进而有利于形成教师个体之间彼此促进的激励机制。

从纵向方面来讲,数字化赋能教师个体师德发展,有利于形成循序渐进的自我激励机制。利用数字技术对高职师德教育评价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每一位教师个体能够精准地把握自己师德的优点与不足,在清楚明晰教师个体师德状况之后,采取扬长避短的原则,富有针对性地促使自身在知、情、意、行几方面都得到相应发展^[15]。加之,数字化赋能的可视化数据信息,确保了教师个体师德提升记录的完整性,教师能够清楚地看到个体师德提升的点滴变化,有利于实现高职师德评价从赋值向增值转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增值不仅体现在教师个体师德提升的增值幅度,更为重要地体现在揭示教师个体师德努力程度,激励教师个体朝着德高为范的人师目标努力奋进。

参考文献:

- [1]程天君,张铭凯,秦玉友,睦依凡,周海涛,郑淑超.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思考与方向[J].中国电化教育,2021(07):1-12+21.
- [2]林一钢,王换芳.以评促建:构建教师发展建设长效机制的路径——浙江省的经验与反思[J].教师发展研究,2021,5(01):54-59.
- [3][美]贝尔戈登,戈梅尔吉姆.全面回忆:改变未来的个人大数据[M].涂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59.
- [4]涂子沛.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以及它如何改变政府、商业与我们的生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62.
- [5][6]邹太龙.高职德育层次性研究[D].西南大学,2015.
- [7][德]康德·伊曼努尔.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547.
- [8]仲建维.德育评价应超越量化取向[J].教育研究,2014,35(05):75-77.
- [9]DANIEL,STUFFLEBEAM.A depth study of the evaluation requirement[J].Theory into practice,1996,5(3):121-133.
- [10]尹伟.德育评价的重心转向及其合理性辩护[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14(02):104-107+116.
- [11]吕成明.师德纳入升学成绩的风险与德育评价的回归——基于康德“人是目的”的人学向度[J].当代教育科学,2020(01):53-58.
- [12][加]麦克卢汉·马歇尔.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
- [13][奥]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肯尼思.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M].赵中建,张燕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4.
- [14]邹太龙.大数据时代德育转型与教师德育素养提升[J].中国德育,2018(03):30-33.
- [15]王逢贤.高职德育过程特点初探[J].教育研究,1979(3):23-26.

(作者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510000)